

《君生我未生》：在爱与痛苦中开出花朵

退休新华社高级记者张严平出版长篇回忆录,讲述她与科学家杨南生之间的动人爱情故事

8年前,张严平失去挚爱杨南生,8年后,张严平用这本书回望杨南生的一生,怀念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日夜夜。她说,我终于用文字拥抱了他

张严平

这本书是在爱与痛苦的土壤中长出的花朵。

8年前,当我失去了挚爱,我的精神垮了。我痛苦不堪,茫然无措地活在世间,常常在清晨醒来时,不断地问自己,你为什么还要活着?我第一次体验到了生的虚无。那时候,我就想逃到一个荒岛上,一个人都没有、特别是一个认识我的人都有的荒岛,忘记一切,在天地间泯灭。

记忆是无法忘却的。那么多的爱,那么深的痛苦,又如何忘却?我失眠,自闭,断绝与一切人的往来,在抑郁症的边缘上下翻滚。直到有一天,无意中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话:“苦难是什么?苦难应该是土壤,只要你愿意把内心所有的感受隐忍在这个土壤里面,很有可能开出你想象不到的、灿烂的花朵。”

那一刻,心中犹如电闪雷鸣,我被震醒,明白了:命运馈赠我的这场刻骨铭心的爱情,以及命运赐予我的无法逃脱的心灵痛苦,正是它向我的人生投下的一片土壤。它要让我在这片土壤中历经花开花落、向死而生,最终开出不一样的生命的花朵。从那一天起,我开始记日记,把心中所有的回忆、痛苦、迷茫、绝望、挣扎……用一行行的文字接住,不断地激励自己:“我要在爱与痛苦之中开出花朵,成为一个心灵有光的人。”

7年多人的寒暑春秋,每一天我都在日记中与我爱的人交谈,与自己交谈,把点点滴滴无法忘怀的爱倾尽笔端,刻进灵魂里;把点点滴滴肝肠寸断的痛洒在纸上,刻进灵魂里;把点点滴滴萌动在爱与痛苦中的醒悟,跃出身体的躯壳,刻进灵魂里。

记忆力会衰退,但灵魂会记住一切。

我就是这样写啊记啊,有时泪雨滂沱,有时窒息无声,有时近乎崩溃,有时在寂静中听到了花开的声音……那时我脑子里并没有明确日后要写出一本书。所有不甘坠落的挣扎与努力,只为无法忘却的爱,只为拯救我濒临死亡的内心。我一次十次百次千次地对自己说:“你必须活出一个比从前更好的新生命,才配得上你所得到的这份珍贵的爱,才不辜负你体验到的这份深刻的痛苦。”

到2020年7月,在失去至爱、孤独抑郁的7年多的时间里,我写下了70多本共300多万字的日记。回身望去,这7年,就像攀登一座险峻的山峰,有时一步之外就是万丈深渊,所幸,我终于没有跌落。

本报记者许晓青、蒋芳

2017年,一部名叫《人民的名义》的电视连续剧播出,引起全国轰动,满满正义感的侯亮平、赵东来与反面人物高育良、祁同伟等,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。

事实上,这部反腐大剧拍摄期间,原著作者、著名小说家周梅森已经开始了另一个“大计划”——小说《人民的财产》(影视剧名《突围》)的创作。

2021年秋,《人民的财产》也成功走上影视化之路,长篇电视连续剧《突围》开播,屏幕上林满江、石红杏、齐本安组成的“师门铁三角”,从工矿一线走上国企领导岗位,社会的嬗变、改革的艰辛,宛如一幅当代国企发展的“清明上河图”,引发观众共鸣。

从《人民的名义》到《人民的财产》,周梅森为当代读者和观众构建起富有个人特点和情怀担当的“小说体系”,这其中饱含着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痛点难点的反思。

近日,周梅森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专访,畅谈近年来的创作心路。他说:“因为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,也是参与者,我看到了很多东西,想到了很多东西。我把心底的东西写出来,于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”

在他看来,《人民的财产》与自己以往的一些作品相比,其创作是非常顺利的。“像林满江、石红杏、齐本安这些人,都在我脑海里浮现很久了。几十年的生活积累,让我找到了灵感,半年多就完成了初稿写作。”

他还多次提到,在今天这么一个“崛起的年代”,各种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,这很正常。我们要有勇气正视,不能在矛盾面前“闭上眼睛”。

以下是记者对话周梅森的问答实录。

生活是我写作的“宝藏”

草地:从《人民的名义》到《人民的财产》(影视剧名《突围》),您将视角从涉案题材转向国企



张严平和杨南生。作者供图

攀登拯救了我。

我在爱与痛苦的跋涉中看到了更大的天地;更清晰地认识了命运馈赠于我的是一个有着怎样高贵灵魂的爱人;前所未有地领悟了这场爱情给予我的是何等辽阔的世界;第一次懂得了痛苦对于我灵魂再造的意义,它打破了我在一帆风顺下形成的平庸与狭小,让我看到了人生更广阔更灿烂的纬度;也第一次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,那是一种包含着痛苦的价值、立足于真实的人生、深刻而持久的灵魂喜悦。

正是在2020年这个夏天,在我亲爱的人离去7年零5个月后的这个夏天,我决定写出这本书。它不在计划之中,也不在努力之内,它是我内心所有情感的洪流涌到这一天不得不喷涌而出的海浪;是在爱与苦难的土壤中,那一颗积蓄了天地之气的种子怦然破土而出的心灵的花朵。

写作的日日夜夜,我就像在旷野中,在风雨下,在山岗间奔跑的人,或者一发而不可止,从清晨到夜晚,不吃不睡;或者踟蹰于一道河流前不知所措。有时一句话没写完,我已失声痛哭;有时我离开书桌,默默地走出房门,让蓝天和阳光充满我悲伤的心房。写作于我就像一场痛而欣喜的疗愈,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一个新的生命在一天天从心灵深处生发。经历了夏天、秋天、冬天,这本书带着一个新生的我终于走到了春天的入口。惊蛰那一天,我去花店里抱回一大捧鲜花,放在日日夜夜陪伴我写作的爱人面前,轻轻地对他说:“我看到了你让我看到的宇宙。”

今天,这本书终于要出版了。我要给它插上一支传递大地之春的风信子献给我最亲爱的——杨南生。我做了一辈子记者,采访过无数人,写出过许多人物,杨南生是我记者生涯中最早认识的采访对象之一,却几乎是唯一一个我没有写出过任何稿子的人。漫长的37年之后,在他走进我的生命,又离开我的生命之后,我终于用文字拥抱了他。深深地感恩!

今后的路还很长,要背上行囊继续远行。我期待《君生我未生》这朵小小的生命浪花,在浩瀚广阔的人心海洋中遇到更多的知音与知己,让我们在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分享中,获得更美好更深刻的力量。

对我的创作内容产生影响。

这两部小说中的人物都来自生活。我和每个中国老百姓一样,追求富足。这些年我也涉足过经济领域,赚过钱,也亏过本。《人民的财产》中,钱荣成、傅长明这种人,我都打过交道,也吃过他们的亏;其中的师门三兄妹形象,实际上就是我青年时代在矿山经历过的一些人和事。这些人和事烂熟于心,总有一天会在你哪部作品里冒出来。生活是我写作的“宝藏”。

周梅森:好像不能分割得这么清楚。我的作品里都会有些案件,只是有时为主,有时为辅。《人民的名义》以案件为主,《人民的财产》以案件为辅;前者社会层面展示较少,仅一个大风厂。后者展示得相对较多,以国企中福集团为主线,涉及当今社会各方面人物。

对国企改革和改革过程中的痛点难点,我一直很关注。20世纪90年代我的作品《人间正道》就触及了国企问题,不过比较浅。嗣后,我开始密切追踪一些大型国企,和一些企业家成了朋友,除了这部讲问题的《人民的财产》,还有一部《大博弈》,讲装备制造企业国企艰难改革,勇敢博弈,冲入“世界500强”的故事,也拍成了同名电视剧,如果顺利,将在2022年播出,小说也将同时推出。

草地:您对国企改革和转型的小说选题,显然带着一种执念和挚爱,为什么?

周梅森:因为我的家庭是一个与国企密切关联的家庭,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国企工作,有的目前还在。我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,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,我有责任和义务,把我人生中印象非常深刻的这段岁月写出来,这一直是我非常惦记的一个题材。

草地:《人民的名义》《人民的财产》有一个共同特点,都侧重于改革开放后,特别是2000年以后中国社会现状的剖析,仿佛是一幅描绘社会百态的长卷,其中人物塑造刻画,社会现象捕捉,均十分传神,这是如何做到的?

周梅森:最近20年我国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,社会上好的坏的都有,这势必也会

不动声色

张陵

张严平的长篇回忆录《君生我未生》是一部好书,而且是一部不同凡响的好书。作品用一个妻子深情的眼睛,回望中国固体火箭科学家杨南生的一生,用一个女性的细腻心灵,去感受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日夜夜,读来感人至深。

科学家的传记,多重理性,重逻辑,而《君生我未生》则重情感,重感觉,有许多独家材料和独有感受,对读者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和解读传主,打开了新的空间,提供了独特的思考。

杨南生早年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,以优异成绩获得自然哲学机械工程学博士学位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带着“实学报国”的理想赤子之心,冲破阻挠,回到祖国,先是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参与研制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,后调到中科院力学所,加入钱学森领导的科研团队,参与了中国第一枚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的研发工作。几十年里,他一直在条件艰苦的大西北科研基地工作,把自己的所有心血和才智都献给了火箭科学事业。

在同批回国的科学家中,杨南生率先加入中国共产党,他自觉把个人的爱国主义理想融入党的伟大事业中,体现了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担当。1964年,他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四分院副院长,在钱学森领导下,接受了“固体发动机”的研制任务。

中国要搞洲际导弹,就必须先把大型固体发动机研制出来。可当时,世界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有能力研制火箭固体燃料,我国在这方面属于一穷二白。西方国家进行严密的技术封锁,连当时还比较友好的苏联也不让我们知道。杨南生团队就是在这样一无资料、二无人才、三无设备的情况下,经过多年科学攻关和反复试验,一点一滴培养着自己的人才,一点一滴打开口子,积累着中国固体发动机的经验,终于有了重大突破——中国有了自己的固体发动机。

今天的航空领域运载火箭,都采用了固体技术。可见,杨南生的研究是带有科技前瞻性和国家战略意义的。这方面,他付出了比任何人都要多的心血,说他为中国火箭固体发动机之父,也不为过。然而,由于历史和工作的原因,他的名字还很少被提到。直到2018年《杨南生传》的出版,社会才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位没有“两弹一星”功勋科学家称号的功勋科学家。

命运给了晚年杨南生一个意想不到的美丽馈赠。60多岁时,刚走出丧妻痛苦期不久,一个年轻的姑娘闯进了他心里。这个姑娘就是大学毕业不久的新华社记者张严平。他们不可思议地恋爱了,并且勇敢地冲破世俗的偏见,结为夫妻。以后的27年里,他们相濡以沫,过着普通人的生活,体验着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,又以浪漫的情怀超越了普通人的生活,体验着人生

的高贵和爱情的美好,由此谱写了他们两人共同生活中最为华彩的激情篇章。《君生我未生》就是这样展开他们27年感情生活的细节。

作品没有过多地展现杨南生科学家的生活,而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,描述杨南生作为普通人的一面。讲述传统文化人家庭的出身对他思想的影响,讲述他对古典音乐的修养,讲述他对文学的热爱和独到的见解。讲述他与张严平恋爱时那些浪漫的事。这个时候的杨南生,用张严平的话,就是一个“如蓝天一般纯粹的人”。

实际上,在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处理上,普通人杨南生的困窘与无能远远要超过科学家杨南生,天一点也不蓝,反而阴霾重重。他人到北京生活了,关系却几十年进不来,所有的解决方案都不奏效。居室常年漏雨,也没有人来帮着修理。他出身大户人家却一生清贫,不看重物质财富,只重精神追求,过着简朴平淡的日子。他淡泊名利,为国家做了那么多贡献,却甘做人梯,与世无争。当那些在他研究基础上取得成就,而不提他功劳的现象不断发生时,他却从不计较,云淡风轻而过。当国庆大典中,中国的导弹经过天安门时,风烛残年的他边在自己小屋里看电视前实况转播,边回忆自己当年的风采和荣光。在这些作者自然而然讲述出来的故事中,我们能读出杨南生的个性品质、思想格局和精神境界,能真切地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、老一代共产党人从不计个人得失的人格魅力和纯净的心灵。

对杨南生来说,对生活的馈赠已经充满感激。他一生为国家民族工作,晚年还得到了真挚的爱情。他已经非常满足于生活对他的钟爱。所以他一方面为国家发挥余热,一方面格外珍惜自己的爱情。从他与妻子的两地书信里,我们读出了他对妻子浓厚的情感、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常人很难有的满足感,也读出了他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道德观。

可以看出,《君生我未生》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有思想境界,有文化品位的人。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,她心中有社会有大局的国家意识,深知一个科学家的道德价值。作为一个妻子,她常常会为杨南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境遇所不平。然而,更多的时候,她爱着,并被这颗懂得爱的灵魂所吸引指引,向着人生更高的境界升华。爱人在世的时候,她被爱人的精神所感动;爱人离世以后,她用每天的日记守望去感受这颗伟大的灵魂,向一个纯粹的人的灵魂靠近,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生,以爱和宽容面对生活,也成为一个人“蓝天一般纯粹的人”。

作者用自己的心呼唤着人间真情,呼唤着爱和美,净化着自己的灵魂,凝聚起科学家杨南生榜样的力量,《君生我未生》这部作品由此实现出深刻的主题,充实着丰盈的内涵,可读而动人。

这样充满戏剧“对立”的角色,您满意吗?

周梅森:《突围》这部戏,演员表现出了齐本安这个角色的复杂性,这个人物不是没有软弱的一面,不是没有犹豫的一面,也不是没想过要退却,但是这么一个人物,最终坚持住了自己的原则抗争到底。

我个人也非常尊敬林满江的扮演者,表演入木三分,很到位。我当初写林满江这个人物,确实太过瘾了。我建议感兴趣的朋友,还是看看书,看看书就可以更加了解这个人物的复杂性。

草地:您觉得个人在创作过程中最大的动力是什么?

周梅森:我想,总有一部分作家去关注现实生活,关注老百姓关注的那些问题,不能装作“看不见”。所以尽管有很多的磨难,但是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作家,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,从事这种职业劳动。

草地:有人说,“周梅森真敢写!”在触碰社会痛点时,您如何平衡戏剧张力与真实感之间偶尔的矛盾?

周梅森:我真没觉得我写的东西尺度大。作为一个作家,我只是尽量客观地描述了我所处的时代风貌,奉献出这个时代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虽然触碰到不少社会痛点,但我写这些作品的目的,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在高速发展中能及时纠错,不能视而不见、讳疾忌医。我的作品总是面对社会现实,直面很多尖锐问题,我是力求讲真话。

草地:您觉得要创作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,最需要把握的是什么?

周梅森:我觉得,要把握住这个时代的本质。这个时代的本质是什么?一方面我们创造了中华民族最辉煌的一页历史,同时也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在这么一个“崛起的年代”,各种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,这都很正常。要有勇气正视这些矛盾,不能“闭上眼睛”,因为真实是作品的生命。

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品格与灵魂

矛盾面前,作家不能“闭上眼睛”

草地:谈谈以《人民的财产》为蓝本拍摄的影视剧《突围》,其中塑造的林满江、齐本安